

美國的離岸平衡戰略 與東亞的次要夥伴： 臺灣有事情境下的日韓困境

◎坂出健／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 教授

◎森本正崇／慶應義塾大學 非常勤講師

◎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翻譯

隨著美國安全戰略轉向「離岸平衡」，將防衛責任轉嫁予區域夥伴，日本、韓國在因應「臺灣有事」時，隨即陷入嚴峻的安保「囚徒困境」。本文認為，日本若率先採取較明確的「制衡」立場，可能反而助長韓國「責任轉嫁」的誘因，導致雙方的威脅認知落差過大，區域均衡亦面臨徹底崩解之虞。針對美國的「財源全盤轉嫁」模式，基於維持自有供應鏈之必要，日本應積極研議「臺灣優先需求清單」等方案，將承擔的防衛成本轉化為「將美國拴在東亞」的戰略槓桿。

關鍵詞：離岸平衡、最後擔保者、責任轉嫁、囚徒困境、戰略槓桿

Keywords: Offshore Balancing, Lender of Last Resort, Buck-passing, Prisoner's Dilemma, Strategic Leverage

前言：東亞地區「高市發言」的衝擊 與地緣政治局勢變化

2025年11月7日，日本高市首相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的答詢，成為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分水嶺。高市首相明確指出，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「存立危機

事態」，並暗示不排除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立場。這番言論並非僅止於國內的政治展演，更是向北京、華盛頓與首爾等各方勢力，展現了高市首相的戰略決心¹。然而，在評估未來的東亞安保環境時，我們必須探討這份「決心」，在美國戰略轉向的巨大浪潮中，究竟具有何種意義。當前的美國已難以承受維持冷戰後「自由主義霸權」戰

略的龐大成本，正逐漸傾向採取更具限縮性且內向的「離岸平衡」（Offshore Balancing）戰略。本文將闡明在美國從「世界警察」蛻變為「離岸平衡者」²的過程中，日、韓、臺這三個東亞的次要夥伴（Junior Partners）所面臨的嚴酷安保困境。

美國對臺灣有事政策的變遷—從拜登政府到川普第二次執政

從拜登政府過渡到川普第二次執政，美國應對臺灣有事的政策，在理念與手法上皆經歷了劇烈的轉變。拜登政府的政策核心可歸納為「綜合嚇阻」（Integrated Deterrence）。這項政策不僅是運用美國自身的軍事力量，更試圖透過多層次結合盟國與夥伴國的網絡，來遏制中國的軍事冒險主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拜登總統曾多次發表「若中國入侵，美軍將出兵防衛」之類的言論。儘管白宮方面屢次出面澄清「政策並未改變」以試圖滅火，但實際上，拜登所言已展現出美方有意使傳統的「戰略模糊」徒留形式，並傾向於強化國防承諾的「戰略清晰」³。

然而，川普第二任期政府則由價值觀導向的戰略路徑，回歸到極度現實且帶有「交易性」特徵的政策取向。對川普政府而言，臺灣與其說是被保護的民主象徵，不如說是對中談判之一張強而有力的「籌碼」，且臺灣作為競爭對手亦帶有損害美國經濟利益的可能。在這種「交易型」外交之下，政策再次回歸到了「戰略模糊」。不過，這並非過去為維持區域穩定而採取的策略性模糊，而是透過為美國參與設下「附加條

件」，從合作夥伴爭取最大讓步的戰略手段。具體而言，美方正施加嚴苛的成本分擔壓力，例如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（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）的文獻指出，川普陣營曾公開要求臺灣國防預算支出應達到 GDP 的 10%⁴。這意味著美國已放棄由自行承擔成本以維持現狀的「霸權戰略」，全面轉向「離岸平衡」戰略：將自身負擔降至最低，同時謀求區域勢力均衡的。

離岸平衡戰略的理論再探討

離岸平衡戰略，是指美國放棄在世界主要地區親自駐紮地面部隊以維持秩序的「霸權戰略（自由主義霸權）」，轉而將區域勢力均衡交由當地主要國家（次要夥伴）負責的一種戰略克制型態。從理論層面重新審視此戰略，對釐清當前美國在東亞的行動原則至關重要。離岸平衡戰略的理論先驅克里斯多福·雷恩（Christopher Layne）主張，美國應正視國力極限並對戰略過度擴張有所警惕。從他的觀點來看，冷戰後的美國在世界各地部署軍隊、試圖輸出民主，結果卻導致了龐大的財政赤字與不必要的紛爭。離岸平衡戰略的目的是切斷這些在「岸上（當地地面）」的常態性介入，將美軍撤回「離岸（海上或本土）」，藉此在保存國力的同時，僅確保其核心國家利益（阻止區域霸權國家的誕生）⁵。

這項戰略的核心機制在於「責任轉嫁」（Buck-passing）。美國不再親自背負壓制如中國這類新興霸權國家崛起的成本，而是將其「轉交」給地理上相鄰的日本、韓國與臺灣等夥伴。美國的介入，將僅限於當這些當地國家的嚇阻失效、區域均衡面臨徹底崩解時，做為「最後擔保



者」(Lender of Last Resort)的局面。此外，離岸平衡戰略中對於「臺灣」的定位，對次要夥伴們蘊含著極其殘酷的暗示。在雷恩等人的現實主義立場中，臺灣並不被視為攸關美國存亡的「生死攸關之利益」(Vital Interest)。為避免與核武強權中國爆發正面衝突之毀滅性風險，逐步縮減對臺灣的國防承諾，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中國的「核心利益」，藉此謀求大國間穩定的「戰略性放棄」或「大交易」(Grand Bargain)，便成為了浮出檯面的合理選項⁶。

對次要夥伴而言的離岸平衡戰略

美國轉向離岸平衡戰略，正迫使東亞的次要夥伴—日本與韓國，擺脫過往在安全保障上「舒適的依賴」。然而，由於兩國所處的地緣政治條件與國內政治脈絡的差異，其接受此轉變的模式呈現極大的對比。

對日本而言，離岸平衡戰略意味著「廉價國防」的終結。戰後的日本以和平憲法為盾牌，僅以占GDP約1%的國防支出，便享受著美國的「核保護傘」與「前進部署能力」。但是，當前美國進行責任轉嫁並退守離岸，日本正被迫將自身的國防力量提升至接近「自主」的水準。

另一方面，韓國的觀點則更為務實且多極化。從李在明政府的角度來看，最大的威脅依然是北韓，而捲入臺灣有事往往被視為「不必要的風險」。韓國對離岸平衡戰略抱持著強烈戒心，其擔憂美國若將資源投入臺灣有事，恐將導致朝鮮半島的安全保障出現漏洞，抑或駐韓美軍可能被轉用於臺灣國防(戰略靈活性)。韓國雖然以

美韓同盟為基調，卻也志在推行不過度刺激中國的「平衡外交」，並試圖在臺灣問題上採取「不介入」的搭便車立場。

臺灣有事時日韓的「囚徒困境」

當美國作為平衡者的影響力衰退時，日韓將陷入典型的「安妥困境」⁷。

制衡(Balancing, B)：自行支付軍事成本，與中國對峙。

責任轉嫁(Buck-passing, P)：將責任推給對方，本國則維繫與中國的關係⁸。

在利益衡量上，日韓兩國的首要考量皆是「對方與中國交戰，本國則採取袖手旁觀的搭便車策略」(收益4)。然而，在對方不參戰的情況下，若僅有本國獨自交戰，意味著將獨自承受來自中國直接的軍事與經濟報復，這將是最壞的結果(收益1)。結果，兩國皆無法選擇「合作嚇阻中國(3,3)」的選項，而是選擇互相背叛(互相推諉責任)，最終收斂於導致區域動盪的「納許均衡(2,2)」⁹。(詳見附表)

附表 臺灣有事時日韓的「囚徒困境」

韓國 日本	制衡(B)	責任轉嫁(P)
制衡(B)	(3, 3) 合作達成的均衡	(1, 4) 日本承擔不對稱的負擔
責任轉嫁(P)	(4, 1) 韓國承擔不對稱的負擔	(2, 2) 優勢策略均衡(納許均衡)

資料來源：作者依Jervis(1978)理論架構整理繪製。(注：表中收益數值4為最優、1為最劣，代表戰略選擇的偏好排序，並非精確的量化結果；此係依據日韓在臺灣有事情境下，考量可能面臨的安全成本、經濟報復風險與搭便車誘因，所建立之概念性分析架構。)

高市首相的發言，意味著在這場困境中，日本已率先宣告將採取「制衡（B）」。

這讓韓國確信「日本將承擔不對稱的負擔」，結果反而助長了韓國的責任轉嫁。美國離岸平衡戰略猶如一種催化機制，將日韓之間的「威脅認知落差」擴大至難以化解的程度。一方面，日本以「臺灣的危機即日本的危機」為由不斷強化制衡；另一方面，韓國卻為了「避免臺灣的危機演變成韓國的危機」，而持續摸索著責任轉嫁（迴避責任）的途徑。

建言：從PURL到PTRL—應對「財源全盤轉嫁模式」

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，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援主要依循「總統撥款權」（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），是以無償或低價提供美軍現有庫存武器的形式為主。然而，隨著美國國內蔓延著「援助疲勞」（Ukraine Fatigue），加上國會批准撥款阻力增大，「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」（Prioritized Ukraine Requirements List, PURL）的構想遂應運而生。在此機制下，烏克蘭提出具體需求清單，並由歐洲等國代為「買單」，購買美國製武器並運送給烏克蘭。對美國而言，這建構了一種「可持續的援助模式」，既能規避本國的財政赤字，亦能活絡本土軍工產業，同時達成削弱俄羅斯國力的戰略目標¹⁰。

面對美國這種「財源全盤轉嫁模式」，日本應如何因應？既然美國退守離岸，日本就有必要維持自有的供應鏈。日本不應僅是默默承受美國的成本轉嫁，更需發揮戰略智慧，將自身分擔的支出轉化為「將美國拴在東亞」的戰略槓桿。具體而言，日本可研議「臺灣優先需求清單」

（Prioritized Taiwan Requirements List, PTRL）方案，例如透過美國之對外軍事銷售（Foreign Military Sales），日本採購部分美製武器以能戰略嵌合臺灣國防需求；或由日方負擔維持對臺武器生產線的成本。這類將財政貢獻轉化為區域穩定保障的構想，極具戰略探討價值。

附注

1. 臺灣有事即「存立危機事態」：高市首相於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之答詢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jgzZn3kqV_U
2. John Mearsheimer. *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* (WW Norton & Company, 2001, p. 237).
3. Richard Haass and David Sacks (Sep. 2, 2020).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: To keep the peace, make clear to China that force won't stand. *Foreign Affairs*.
4. Caitlin Campbell (Feb. 9, 2026). Taiwan: Defense and Military Issues.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(CRS). <https://www.congress.gov/crs-product/IF12481>
5. Christopher Layne (2006). *The Peace of Illusions: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* (p. 160)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
6. John Mearsheimer, "Say Goodbye to Taiwan," *The National Interest*, February 25, 2014.
7. 譯註：本文作者併用「囚徒困境」與「安保困境」兩項概念。兩者的關聯在於，當美國不再直接承擔制衡東亞霸權的責任時，日韓兩國將先面臨結構性的「安保困境」（互信不足且擔憂對方背叛）；此種不安全感，進而迫使兩國在面對中國威脅時，雙雙陷入採取「責任轉嫁」以求自保的「囚徒困境」博弈之中。
8. John Mearsheimer (2001). *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* (p. 139). W. W. Norton & Company.
9. Robert Jervis (1978). *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*. *World Politics*, 30(2), p. 171.
10. Ministry of Defence of Ukraine (MoD) (October 15, 2025). How NATO, European partners,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strengthening Ukraine through the PURL initiative. <https://mod.gov.ua/en/news/how-nato-european-partners-and-the-united-states-are-strengthening-ukraine-through-the-purl-initiative>; Takeshi Sakade (Nov., 2025). *Trump's Arsenal of Democracy: From Wales to The Hague*. Kyoto University,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, Discussion Paper Series, No. E-25-009.